

● 环球随笔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侧记

[法]陈力川

反 战 游 行

从巴黎动身去巴西前,金丝燕送给陈越光一本书,说让他开会没事儿的时候看看。书的名字叫《阿弥陀经讲解》。我心里想,越光远道从中国来,让他到巴西去念经,是不是有点儿舍近求远呵?

1月23日下午,一场近十万人参加的反战大游行拉开了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的序幕。这是一场既激烈又温和的集会示威。说它激烈是因为高音喇叭的尖叫声,示威者的呼喊声,喧天的锣鼓声不绝于耳;说它温和是因为持续五六个小时的游行自始至终不紧不慢,秩序井然,警察骑着马,前后左右袖手旁观。同一时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第三十三届世界经济论坛动用了两千名警察、一千五百名军人,保护两千一百五十位与会者,军警加起来比开会的人还多,戒备之森严已经让人不寒而栗,雪山上零度以下的气温更使人寒而生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开幕词中把在伊拉克战争阴霾笼罩下举行的本届经济论坛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相比之下,波尔图-阿莱阁正值摄氏三十度的夏天,社会论坛自发的反战游行不仅气氛热烈,而且色彩斑斓,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各族人民的节日:身着鲜艳裙装的巴西少女,头戴草帽的巴拉圭少年,浑身插满羽毛的印第安土著人,草绳裹体的爱斯基摩人,围巾蒙面的巴勒斯坦妇女,外套坎肩的阿根廷男子,身披褐色长袍的天



世界社会论坛反战游行

主教僧侣,模仿古巴英雄切格瓦纳一身戎装的拉美青年,还有裙子裤子一起穿的印度妇女……别说西装革履的人一个没有,就连像我和越光这样穿衬衫长裤的人都觉得有点儿不合时宜。放眼望去,反战的游行队伍中大都是年轻人,给人一种年轻人不好战,未来世界更安全的感觉。仔细想想,这可能是一种错觉,因为不管是否出于自愿,上战场的不也都是年轻人吗?无论如何,这里的年轻人又唱又跳,搂搂抱抱,使人想起法国1968年5月风暴“要爱情不要战争”的口号。这些年轻人约莫有三万左右,大部分来自美洲和欧洲,他们在一个名叫“和谐公园”的草坪上安营扎寨。这个“国际青年夏令



世界社会论坛反战游行

营”是按照最严格的环保标准建立的,年轻人过着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尽可能打破种族、宗教、文化的藩篱,相互友爱,好像要以行动证明地球不需要战争也能转动。有一天开完会,我去参观这个夏令营。最让我惊讶的是和拉美青年用互相听不懂的语言也能交谈半天。那种感觉又像是对话又像是自言自语,但他们的友善和关爱是不需要通过语言也能感受到的。遇到讲英语和法语的人,问他们为什么反战?一个来自圣保罗的女学生回答说:“我不



国际青年夏令营一景

只反对某一国对另一国动武,例如美国攻打伊拉克,我以生命的名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一个哥伦比亚学建筑的男学生回答说:“反战就是反对美国的石油政策。因此反战也是一个生态环保的问题。”另一个学哲学的小伙子说(我忘记问他来自哪个国家):“我们拒绝接受这个世界的金钱逻辑,战争就是金钱的耀武扬威。”原来我总以为反全球化的人,年纪大的关起门来开会,年纪轻的在街上与警察对垒。听了他们的话,我觉得眼前绝不是“垮掉的一代”,我们没有理由对年轻人失望,我们更没有理由让年轻人失望。

思想工厂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是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与前两届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反达沃斯的口号相比，这个口号显然更具有建设性。连续五天的一千七百场大小讨论会、辩论会、圆桌会、讲座围绕五个主题展开：民主与持续发展；人权的原则与价值，差异与平等；媒体、文化与反霸权；政治权力、公民社会与民主；世界民主秩序，和平与反对军国主义。每个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向论坛申请举办讨论会，组委会免费提供会场，并配备两名同声传译人员和耳机。邀请我们参加论坛的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就主持了几个讨论会，主题是“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具体讨论的问题有：“国家改革与社会协调管理的原则”；“农业、世贸组织、环境与人权”；“土地所有权问题与世界农民组织的合作”等等。

在讨论中，陈越光提出“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的联盟思想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延续，在哲学和社会变革方面可能会对中国产生新的影响。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执行主席卡兰姆(Pierre Calame)认同联盟思想与人道主义普世价值的精神传承，但也强调与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几点不同。他说：一、我们不赞成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关于人类进步是直线式的，法国处在人类进步中心位置的说法。我们肯定不同文化的价值，而且将文化的多元性视为人类应当保护的共同财富；二、启蒙思想家，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政治家强调民族国家的概念，国家主权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我们质疑国家绝对主权的理论，我们思考人类未来的基点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人类共同体。我们认为国家不过是全球管理系统中的一个级别，因此应该有一个合法代表世界各大区的议会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三、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共和主义者普遍认为政府和政党可以代表人民的利益。现在我们认为人民的利益无法全部

由政府 and 政党代表，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处在一种公民自治的状态。面对地球南北之间、社会内部贫富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的不平衡，公民社会有必要思考一个协调管理的整体方案；四、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科学和理性坚信不移，他们相信科学、技术与工业的结合将导致人类的进步。现在我们都知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科学主义的神话，科学技术应当重新回到工具的位置，其本身不能成为目的。现阶段我们应该奉行谨慎原则：“在没有能力把握一种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当下或未来危险之前，人类社会不应当生产和运用这种产品和技术”，例如转基因。

听卡兰姆这么一说，才发现“联盟思想”的倡导者与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分歧还不小。不过他们的人道主义理想是一脉相承的。只是18世纪的法国人道主义者没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今天欧洲的人道主义者更具有文化多元的国际观。两代人道主义者的变化也说明“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在本届论坛多得难以数计的讨论会、辩论会中，有一个别出心裁的题目叫“世界社会论坛如何摆脱竞争与权力的逻辑？”参加讨论的人模仿论坛的五大主题，罗列出可以使未来论坛失败的五大因素：一、增加不透明性；二、领导层集权；三、加强竞争和排斥；四、为参加论坛的人制造生活麻烦；五、阻挠创造力，破坏论坛欢乐的节日气氛。这些不能做的事情正是论坛成功的经验，他们用这种说反话的方式为论坛敲警钟，真可谓煞费苦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的非政府组织没有一个以组党参选参政为目标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传统的政党政治已经失去了信心。但矛盾的是，他们却要求并不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重视它们的存在，采纳它们的意见。法国天主教反饥饿委员会的秘书长法尔多(Jean-Marie Fardeau)解释说：“公民社会的责任不是执政，而是影响政党、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决策。”在本届社会论坛期间，许多非政府组织第一次与他们一贯批评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劳工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代表坐在一起辩论，但极左派坚决反对论坛邀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代表与会。

就连有意参加论坛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因安理会可能通过一项批准对伊拉克动武的决议而被论坛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工人总统

1月24日中午,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巴西总统鲁拉(Luis Inacio Lula da Silva)接见了世界社会论坛国际委员会的部分成员。经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的皮埃尔(Pierre Vuarin)引荐,我陪越光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会见。等在 Sheraton 酒店大厅的时候,我和一位名叫弗达多(Marcelo Furtado)的巴西绿色和平组织成员交谈,他说人民听鲁拉怎么说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到了看鲁拉怎么做的时候,或者说他到了少说多做的时候。我提醒他说,鲁拉不是已经宣布成立了一个“社会救援部”,还实施了一个“拯救饥饿计划”吗?弗达多说那都是象征性的。巴西真正的问题是四千五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两千万文盲;三千四百亿美元的公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每年向国际金融机构借新债还旧债已成为巴西无法摆脱的梦魇。弗达多还说鲁拉的选民不是不知道他的难处,但还是希望这个“冶金工人”能创造奇迹。对人民的期待和重托鲁拉有清醒的意识。他对社会论坛国际委员会成员讲话时说:“我一生有两大使命,一是当年成功地改造工会;二是现在要改造这个国家。我们在四年内一定要做到:一、公民广泛参与政治;二、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三、普及医疗;四、人民充分行使公民权。我有两件事不能做,一是不能背叛信念;二是不能以为我现在是万能的,什么都能做到。但我会告诉人民和反对派,第一,他们有权批评我;第二,他们必须和我团结一致,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巴西。”

对于一个五十七岁的人来说,鲁拉显得苍老了一点儿。但他的目光炯炯有神,威严中透出宽厚和蔼。他童年时,家境贫寒,曾在圣保罗街头为人擦皮鞋、卖水果,十四岁就进了工厂当金属工,后来成为著名的工运领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是反对军人独裁的代表人物。他于1980年2月成立的巴西劳动党,如今已经成



巴西总统鲁拉会见论坛国际委员会成员

为拉丁美洲第一大政党。鲁拉的身世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民粹主义者。他的经验说明政治远见和道德勇气对一个从政者来说远比他的家世和学历更重要。会见结束后,看着他拥抱每个前来致意的人,我心里想,这是一个十足贫穷过的人,但他也是一个十足幸福的人。上帝给他的财富就是他那百折不挠的精神。我想起他刚才劝慰一位阿根廷代表的话:“对未来不要悲观失望。我就是个例子,我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失落和艰辛中坚持下来才有今天的。希望你们永远也不要失望。”

1月24日晚,鲁拉在社会论坛的大会演讲中宣布,他第二天要动身去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众人闻讯立即分成支持者和反对派两个阵营。反对派的人数好像远远超过支持者,而且很多还是论坛的重量级人物。社会论坛的组织者甘地多(Candido Grzybowski)批评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伦理和社会两个方面已经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鲁拉在这个时候去达沃斯无异于帮助这具僵尸起死回生。”有的反对者甚至将不满的情绪付诸行动,将一个奶油蛋糕扣在接替鲁拉担任巴西劳动党主席的约瑟-热诺(José Genoio)的脸上。然而参与发起巴

西社会论坛的葡萄牙社会学家桑多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则认为:“鲁拉是经济一体化所造成的人类苦难的象征,与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面对面的斗争可以唤醒新的世界良知。”巴西著名畅销书作家保罗·科艾洛(Paulo Coelho)也为鲁拉的瑞士之行叫好:“这个人会使整个拉美的面貌为之改观。他当面告诉所有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人,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与不平等做斗争。”

其实鲁拉今年去达沃斯的时机不错。本届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建立信心”,这等于变相承认实行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有信心危机。达沃斯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兼主席施瓦柏(Klaus Schwab)以自嘲的口吻说:“如今企业主成了过街老鼠。”本届经济论坛在四十六个国家所做的民意调查无疑为他的这个说法提供了佐证:只有30%接受调查的人对跨国公司的老板表示信任。当然信誉最低的是美国政治家,信誉最高的是非政府组织负责人(56%),其次是联合国领导人(42%),宗教领袖(41%)。就连一向以接待世界经济首脑和各国元首为荣的达沃斯居民也要求明年的经济论坛搬家易地。在这个世界一体化的鼓吹者被要求反省和忏悔的时刻,鲁拉被视为一个历经磨难但坚守信念的先知。他提醒聚集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决策者们说:

“达沃斯崇拜的上帝是市场。但是公民的自由和安全是自由市场的先决条件。我们赞成自由贸易,但自由贸易必须是相互的。如果富国一边鼓吹自由贸易,一边实行保护主义,那我们所有的出口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今天世界上的富国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它们抓住了历史赐予的机会。如果它们忠实于自己成功的经验,它们就不能、也不应该阻碍发展中国家前进的道路。相反它们应该与我们合作,制定一个共同发展的日程表。在这个意义上,我呼吁七大工业国和国际投资者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基金,用来消除第三世界的贫困和饥饿。……我们最终应当承认,贫困、饥饿和匮乏经常是产生宗教狂热和偏执的温床。”

据说鲁拉在达沃斯赢得的掌声比所有全球化政策的鼓吹者都多。这是否也是这届经济论坛弥漫的自责气氛和信心危机的反

映呢?

移师印度

在本届社会论坛闭幕的记者会上,论坛的组织者契柯(Chico Whitaker)宣布第四届论坛将于2004年在印度举行,他说印度是人类社会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缩影,在印度举行论坛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亚洲非政府组织参加,而且是社会论坛国际化、区域化的重大标志,让从巴西开始的社会论坛在世界各地到处开花是论坛长远的战略目标。契柯没有告诉记者的是,几天前他在论坛国际委员会的年会上主持了一场关于是否让印度举办下届世界社会论坛的激烈辩论。最初巴西组委会和拉美国家的国际委员会成员全都反对论坛移师印度,甘地多发言时极力强调波尔图-阿莱阁的象征意义以及论坛与拉美国家社会运动的历史渊源。言下之意有点儿质疑印度公民社会的力量和民间的组织能力。印度代表发言介绍说,2003年1月初在印度海得拉巴举行的亚洲社会论坛吸引了两万人参加。支持下届论坛迁往印度的代表也指出,迄今为止,反全球化基本上是欧洲和拉美的白种人运动,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参与者很少,巴西论坛的代表性于世界人口的分布完全不成比例。既然社会论坛的国际化进程意味着将论坛区域化、地方化、主题化,那么在印度举行世界社会论坛,最重要的不是移植巴西模式,而是团结亚洲和非洲的民间力量加入到论坛的洪流中来。支持者的观点政治正确,在道理上很难反驳,但在感情上(可能还有经济上),还是通不过。最后巴西组委会建议的方案是:2004年在印度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区域社会论坛;2005年仍然在波尔图-阿莱阁举行第四届世界社会论坛。结果是大约三分之二的成员赞成,三分之一的人反对。由于论坛国际委员会的政治构架是平行责任制,既不讲下级服从上级,也不讲少数服从多数,更没有一票千金的否决权,所以只能继续辩论,直到有不同意见的多方取得共识为止。这还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既不能让多

数专政,又要避免少数专权。但接下来的辩论就少不了激情演出了,许多潜台词也都浮上了台面。一名菲律宾代表甚至批评“一部分巴西人在脸红脖子粗的古巴代表的支持下,抱着金腰包不放”。“金腰包”指什么,他没说明。可能是指十万人参加论坛两千万美元的消费给巴西带来的收益。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有人发言呼吁妥协顾全大局不要让达沃斯的敌人看笑话。巴西组委会只好重新提出妥协性的建议:2004年世界社会论坛在印度召开,2005年再回到论坛的发源地波尔图-阿莱阁举行。这一次,除了古巴代表仍然脸红脖子粗地反对以外,其他人没举手表决就一致通过了。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终于平息下来,大家好像都饿了,于是一致赞扬鲁拉把反饥饿作为首要任务的决定。只有皮埃尔不想吃饭。他提议以波尔图-阿莱阁公民的名义刻一块石头送给印度公民,象征社会论坛精神的传承。不知道是因为这项提议不需要讨论,还是大家已经没有力气再讨论什么,反正没人反对就算认可了。皮埃尔说到做到,在闭幕式的记者会上,这块石头果然亮相了,只见上面刻着:“发扬交流、创造、团结、自由的精神,建设另一个世界。”我对皮埃尔说:“应当把‘辩论的精神’也加上,如果不是那场让人精疲力竭的辩论,哪有你这块石头。”皮埃尔笑着摇摇头说:“这跟辩论无关,我开了这么多年的会,别的没闹清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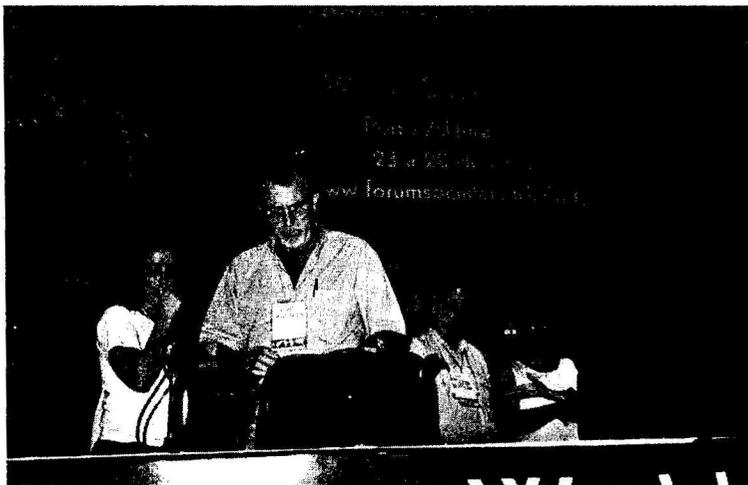


波尔图-阿莱阁公民向印度公民赠送石刻

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每到吃饭时间提出的建议十之八九都会被吞下去。”

一室千灯

在闭幕式的记者会上,有人提问世界社会论坛是否应当与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建立对话机制。巴西组委会成员玛丽莎(Mariza)女士回答说:“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代表了世界各国的大企业主。然而波尔图-阿莱阁的世界社会论坛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组织,而是成千上万个组织交流思想和经验的场所,每个组织只代表它们自己,有权各行其是。社会论坛将保持这一多元松散的形式,只有民主辩论,不搞统一思想,不设发言人,也不发表共同宣言或声明,因此我们不能与达沃



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闭幕式记者会

斯建立对话关系。”玛丽莎女士的回答显然基于世界社会论坛的《原则宪章》。这个《宪章》的第五条规定:“世界社会论坛联合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公民社会运动和组织,但论坛本身并非世界公民社会的代表机构。”第六条中的一段说得更明确:“任何人都不允许以论坛的名义代表所有与会者发表立场声明。”尽管《原则宪

章》作为论坛的纲领性文件得到了大部分非政府组织的认同,但也有一些极左派的激进人士公开主张将论坛唤起的运动热潮导向同资本主义宣战。他们甚至呼吁推翻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少数人还提出解散欧洲联盟,代之以“人民欧洲”。不过论坛秉持和平非暴力的理念,不接受任何军事组织参加,激进派的观点可以存在,但不允许任何暴力倾向。

离开波尔图-阿莱阁的当天上午,我和越光利用闲暇去植物园参观。与喧嚣的论坛会场相比,这里显得异常安静,令人想起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词句“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走出凤梨科的温室,又来看仙人掌科的植物,或许是受到无数花草品种的触动,越光忽然说道:“金丝燕送给我的《阿弥陀经讲解》中有句话可以用来形容社会论坛的多元性:‘一室千灯,光光互遍,重重交摄,不相妨碍’。”

“一灯之光不碍众灯之光,众灯之光不碍一灯之光”,这正是参加本届世界社会论坛的近五千个组织“和而不同”的写真。然而,它们共同发射出的这片光芒正在照向全球。

中国拥有十三亿人口,在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上几乎全面缺席。“中国正忙着与世界接轨。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化的接轨已初步完成,接下来就轮到接反全球化的轨了。”在波尔图-阿莱阁机场的候机厅,来自西班牙的拉蒙教授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

2003年2月8日—12日,于巴黎

附:

巴西总统鲁拉在接见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 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及观察员时的讲话

最重要的是社会论坛能为人类未来社会带来的意义,还有社会论坛对人类唤起的激情。我们有时在一个地方做的事在国际上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侧记

产生了影响,而有的没有,这不好预计。社会论坛的影响力并不是一开始就预见到的。总的来说,我们的能力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1999年我想发起拉丁美洲三十多个组织的联盟,分歧很大,没有成功。我当选后,又把他们召集起来协调,这次就顺利多了。唯一没有参加的是阿根廷,阿根廷是谁也调动不了的,唯一能调动阿根廷的大概是马拉多纳(众笑)。

随着民主化的进程,公民社会的空间越来越大。民主进程使我们产生许多惊喜,1985年没有人能预计我们劳动党能获胜,1988年我们就得到了40%的选票。关键看人民能不能理解你的主张。其实,左派赢得大选的潜在可能性在许多国家都很大,如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左派在这些国家的胜利最终就会导致左派在一个大洲改变局面。1988年我们赢得40%的选票,媒体提都不提,而我们现在的胜利其实就是那时奠定的。社会论坛也一样,第一届媒体也不太关注,以为只是热热闹闹而已。第二届就不一样,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更容易了,已经有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现在他们倾听我们的兴趣就大多了。当然,我作为总统,责任更大了,也更忙了。劳动党的胜利,不仅属于巴西,它影响了拉美,甚至世界。我们的口号不是要创造另一个世界吗?劳动党当选就是一个尝试。

在人权和改变社会劳苦大众的命运方面,我们不能犯错误,我们没有犯错误的空间。一旦丢失政权,五年内不可能夺回来,这就失去了历史机会。这次选举胜利,不能归功于个人的聪明、风格、魅力,不是个人因素决定的,而是局势使然,它是人民意愿的一种表达。政治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想好了说,一种是只想不说。大选胜利只是开始,我们要证明我们不仅能赢得选举,而且有能力带来其他改变。有些东西是属于富人的,取决于钱;而有些东西是政策可以调控的。我们是穷人,取决于钱的事可能会超出我们的能力。但我们在四年内一定要做到:一、公民广泛参与政治;二、孩子们都能读书;三、普及医疗;四、公民权的行使。一切的一切首要的是与饥饿作斗争,不能有人挨饿!公民社会就是我们达到这个政治目标的工具。巴西有2000万文盲,我们没有理由不先在年轻人中消

除文盲。尊重民主,遵守承诺,脚踏实地,这就是我们的方法。

我一生有两大使命,一是当年成功地改造工会;二是现在要改造这个国家。巴西劳动党当初是弱不禁风的,而现在是拉美第一大党。我从未想过要去见布什,现在看来要去见见了。去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我会告诉他们:你们的经济政策是不好的!这种声音在那里发出听到的人会更多。巴西的穷人和第三世界的国家都会为我去达沃斯而感到自豪!我现在跟你们说的,在那里会无一保留地说出去,我不是个两面派。

我们外交的一个重点是与非洲国家建立密切关系。我们要把巴西失去的时间找回来。

巴西头一次产生了一个真正人民的政府。原来我的任务是调动人民反对政府,现在我仍然要调动人民反对政府,因为我认为公民社会是独立的,他们不发出反对的声音就是不健康的。听不到人民批评的声音,政府就是一个危险的庞然大物。〔热烈鼓掌〕

(菲律宾代表问:明年社会论坛在印度召开,我们组委会邀请您,您去吗? 阿根廷代表问:穷国负债累累,你去 Davos 能否向巴黎债权国俱乐部提出免除债务的问题? 不然,我们还了债,他们再放给我们,再还再放,永远压榨我们。鲁拉笑着插话: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我可以作上帝的候选人。厄瓜多尔代表问:您是否反对美国搞的美洲自由贸易联盟? 埃及代表问:你的职位不光是属于巴西的,巴西创造了穷人选举一个穷人来改变命运的先例。你的失败也不仅是巴西的失败,是这一努力的失败。你准备怎么做?)

我的办法是:第一,不当圣诞老人,不可能所有人的要求都满足;第二,我能做到的就做,做不到的就告诉人民,决不隐瞒。告诉朋友和人民,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政治家的工作是把可能的变成现实,而不是把不可能的也变成现实。

我有两件事不能做:一是不能背叛信念;二是不能以为我现在是万能的,什么都能做。但我会告诉人民和反对者,第一,你们有权批评我;第二你们必须和我团结,这不是为了我,是为了巴西。

我知道人民对我的期望非常大,我也知道我的政敌正在说:你们看他干不了什么吧!一方面是极大的期待,一方面是反对派正等着看笑话。你们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了吧!〔笑〕

对于亚洲的邀请,我去印度!〔鼓掌〕因为我们现在需要互相更多的了解。我们虽然在同一个运动中,但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彼此还是不很了解的。不过,我知道社会论坛有它的独立性原则(指世界社会论坛原则宪章规定不邀请各国元首与会——记录者)。

我们应该批评国际放债国,但也该批评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借债腐化!究竟谁是罪魁祸首?现在,从我们开始不用国际贷款来搞贪污腐化,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

对于美洲自由贸易联盟(ALCA),我的立场是要保护我们的农业、工业,如果这个市场的规则是公平的,我们就会参加;如果它的规则是不公正、不道德的,我们就反对它。面对欧洲共同市场,面对亚洲市场,我们美洲也需要共同市场。共同市场之间更可以互相参与。我们不能笼统地反对经济,而要在经济活动中帮助穷人。放弃经济就不能帮助穷人。如果这个经济是建筑在军事上的,我们就反对。因为投入的军费越多,投入建设的钱就越少。

不要对未来悲观失望。我就是例子,我是经过多年努力,在非常失落、辛苦中坚持下来,才有今天的。希望你们永远也不要失望。(热烈鼓掌)

2003.1.24. 中午于巴西波尔图-阿莱阁 Sheraton 大酒店

现场口译:皮埃尔·吴瀚(葡译法)

陈力川(法译中)

文字记录:陈越光

(未经鲁拉总统审阅)